

# 现代社会建设的传统资源与本土实践

连 连

(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副教授)

社会建设出现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旨在缓解因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其根本任务是:(1)建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社会机制;(2)形成调节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3)构建控制社会风险、促进社会整合的价值认同。社会建设的核心宗旨是重建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落脚点则是一个自主、自治、具有自我行动能力的社会的形成。<sup>③</sup>正如起源于西欧的全球现代化是一个多样性与同质性并存的发展历程,始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建设,作为对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回应,同样置身于因时空差异所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维度之中。

## 一、社会建设与传统资源:西方的经验

托克维尔在考察 19 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时,强调民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他认为,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乡镇的强大和独立在于大多数人参与乡镇管理和公共事务,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sup>④</sup>亨廷顿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民情恰恰在于保留了更多中世纪英国都铎时代的政治传统。<sup>⑤</sup>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乡村的人民已具有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到 13 世纪时,大城市基本上成为享有自主管理权的自治市,并有权派代表出席全国议会。<sup>⑥</sup>17 世纪以后这一传统被英国移民带到北美殖民地,并在独立之际创设了实行分权与制衡的联邦制度。耐人寻味的是,政体“依然是古老而陈旧”的美国,却向世界展示了“最先进的、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社会和

---

① 王小章:《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社会学》2010 年第 6 期。

②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③ 参见王小章:《论以积极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建设》,《浙江学刊》2013 年第 4 期。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71—76 页。

⑤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 年,第 100—111 页。

⑥ 顾俊礼主编:《西欧政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42—243 页。

经济的根本性变革”与“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结合在一起”<sup>①</sup>,成为其发展和强大的基础和动力。

如果说美国的历史向我们证实了传统和现代性并不处于相互对立和排斥的状态,每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传统的政治文化可以创造出最具活力的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那么,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以地方自治为内容的制度变革的追踪考察,则强调了历史连续性对制度成功与否的深刻影响。他发现 20 世纪末在意大利公民参与积极的地区,几乎都是北方那些在 19 世纪拥有众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互助会的地区,而早在 12 世纪,那里便通过邻里组织、宗教组织和同业公会共同促进了城市共和国的兴旺发展,与剥削和依附关系得以长期再生产的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②</sup> 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它受制于北方城市共和国与南方庇护等级制两种政治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并对当代意大利的制度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样,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把南北美后殖民时期的表现与其各自的殖民传统联系了起来。北美得益于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之传统。南北美的差异与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sup>③</sup>

由上述西方历史经验可知,社会建设作为各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规定性任务,既面临如何解决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利益分配与制衡机制,社会共同体与价值认同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任务,同时更要面对如何把握社会建设的传统资源和文化语境,如何挖掘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形式,以及如何使当下的社会建设与本土实践中的“路径依赖”相契合等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和挑战。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建设进程,都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运动中,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现实张力中达致良性互动的努力和实践。

## 二、社会建设与传统资源:中国的遗产

尽管以大一统为特点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没有出现类似意大利南北方因传统资源的差异而予以当代社会或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情形,但是历史遗产的双重性却是我们探讨中国社会建设与传统资源关系需要正视的问题。一方面专制主义权力崇拜、等级观念的历史遗留,农业文明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以及重私德轻公德、重人情轻制度的社会心态,制约着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确立,也导致公民意识、公民责任的匮乏和缺失,并阻碍着具有责任意识 and 自我行动能力的现代社会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传统社会的历史遗产仍然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效力和作用,并为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和文化资源。诚如希尔斯所言,对既有传统的拥护“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事实”<sup>④</sup>。罗荣渠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sup>⑤</sup>。因此,考察传统资源对中国社会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既是认清社会建设路径依赖和特殊国情的关键所在,也是以文化自觉和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建设的必经之路。

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及其价值认同,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社会建设得以实现

①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18 页。

②③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210—211 页(译者的话)。

④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 页。

⑤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76 页。

的根基。因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sup>①</sup>。由于“价值系统所涉及的不仅是观念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sup>②</sup>,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和日常伦理,传统价值观可以通过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双重展示,以中国社会转型与自身的合理性传承为指向来获得其现代转换。儒学核心价值观“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契合了现代社会的博爱精神,一种超越家庭和小团体之上的社会大爱。传统“孝”之本质属性乃“仁爱”,它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和元德,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根本和特征。<sup>③</sup>其核心理念“亲亲”所内涵的“普遍价值”仍然为当今社会所广泛认同,并构成了代际行为的基本准则。风险社会的来临和生态危机的频发,则凸显了“天人合一”观念的价值和意义。社会变迁与分层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使“和而不同”观念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面对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传统义利观则对限制功利原则的价值越位具有积极的作用。在狄百瑞看来,“公与私的平衡(公私一体),绝非个人或个体服从集体或国家,这始终是儒家的理想”。尽管儒家社群主义传统笼罩在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阴影下,但它一直在提倡基于自愿的替代性方案,以促成一种更加平衡的个人、社群与国家的关系。<sup>④</sup>

在社会生活层面,作为基层组织的家族构成了传统社会的核心资源。不同于欧洲的历史,虽然春秋战国以后宗法制瓦解,但在秦以后的历朝历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sup>⑤</sup>、家族与君主制相适应,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正如钱穆所言:“‘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sup>⑥</sup>它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且构成了精神文化的堡垒。<sup>⑦</sup>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家庭会妨碍公共精神与公共事业,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关乎“个人”,很少谈到家庭伦理,基督教也同样淡化家庭观念。直至近代,众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仍不谋而合地抨击家庭、赞美公有制。<sup>⑧</sup>而家族是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性单元,并因此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差序格局和人情网络<sup>⑨</sup>。那么,家族作为历史遗产对中国社会建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构成一种独具价值的社会资本抑或成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现实阻碍?西方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如何与这样的文化语境相契合?都是需要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 三、社会建设本土实践的意义

本文所说的本土实践,既具历时性和共时性,亦兼顾各国实践的广泛性。探讨社会建设本土实践的意义,立足于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在基于对传统资源所做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其在中国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洞悉社会建设的路径依赖和特殊国情,这对当下的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性的借鉴意义。

①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15页。

②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文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③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④ 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7、143页。

⑤ 宗族有明确的父系祖先与谱系,包含若干分支家族。参见朱凤翰:《西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⑥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页。

⑦ 赵庆杰:《家庭与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⑧ 安希孟:《家、国、同胞,与天下万民——中西哲人及基督教的家庭观》,《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⑨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9—35页。

作为传统社会最基层组织的家族,既是带有自治性的团体,即具有管理族人及族中事务的自治性,<sup>①</sup>又是国家权力扩张与渗透的结果。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不仅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治安、司法、产籍管理、赋役征派等行政职能,而且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社会救济等再生产领域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同时还成为推行道德教化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念的主体力量。<sup>②</sup>历史发展到今天,家族历经社会变迁的冲击和政治革命的摧毁却没有消失,反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之际,从古代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社团的方向变化。<sup>③</sup>家族活动和组织复现的原因,在于它既满足了农民的一种“本体性需要——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sup>④</sup>,又弥补了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地区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同时还能个体经济提供合作或援助的有效社会网络及行为规范。钱杭在江西中部地区的调查发现,当地宗族具有很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和观念。尤其在基层政权的关系上,宗族组织谋求与其合作和相互协调,在相当多的宗族组织中,基层政权领导人直接参与并担任某些重要职务,他们对引导宗族活动在合乎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有重要作用。<sup>⑤</sup>

显然,宗族、家族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传统资源,忽视它们的存在和作用,或视之为有违现代社会的历史遗留物,都是对中国社会的教条认识和简单解读。我们既要正视家族的建设性与阻碍性作用,更要看到家族历经适应性变革后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和意义。如何将传统家族资源与当前农村社会的自治建设相契合,在规避其狭隘性、封闭性与不协调性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建设的制度创新,整合多元时代的价值认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第二,在路径依赖和特殊国情中进行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以文化自觉实现制度创新,这对当下的社会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规定性,传统资源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制约力量。孙中山既痛感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同时又设想以宗族团体与家乡基础来联合扩充至国族团体,由此养成民族主义和团结的力量,并认为这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国家所不及之处。<sup>⑥</sup>其言所及的正是路径依赖下传统资源再生产和再创造问题。

就此而言,除了要思考家族、社学、乡约和善堂等传统资源以及从清代的地方自治到民国的乡村建设等经验,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观念、组织形态等方面予以借鉴和转化外,西方模式引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同样应予以关注。研究者发现 20 世纪初西方自治模式进入中国遭遇具体国情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传统自治形式适时地填补了自治变形后留下的空间,使上海自治融合为两种模式的结合。<sup>⑦</sup>历史与现实的碰撞能使今天的我们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维度中,藉由学理思考到社会实践的沟通往复,更具文化自觉之意识与推陈出新之可能。

如果说上述本土实践使我们避免了对西方模式的简单误植,但又可能使人陷入无法摆脱路径依赖的沮丧之中。那么,帕特南的研究则表明,“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无论意大利南北方,改革都转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真正的地区自治。<sup>⑧</sup>而上海自治不仅使华界在市政、慈善、卫生、教育方面日益赶上租界水平,并且还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原因在于自治内容无不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切身的关系。<sup>⑨</sup>因此,社会建设如何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中取得突破,不

①③ 冯尔康:《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37、1 页。

②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3 页。

④⑤ 钱杭:《宗族的传统构建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52、238—249 页。

⑥ 孙文:《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30 年。

⑦ 周松青:《异化、国家和记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两难》,《史林》2007 年第 2 期。

⑧ 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 216—217 页。

⑨ 周松青:《异化、国家和记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两难》,《史林》2007 年第 2 期。

仅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而且取决于生活世界的不断实践和纠偏。

这样的本土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以及在此基础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转化。家族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根植于国人对“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sup>①</sup>的生活共同体的渴求,这也是西方社会同样珍视的生活形态。帕特南对 20 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变化的考察,正是源于对“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即社会资本衰减的担忧。<sup>②</sup>传统的家族和邻里关系在作为中国人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应具有其借鉴意义和普遍价值。而西方实践所展示的传统共同体可能是公民性最弱的现实,以及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公民共同体死亡的结论,<sup>③</sup>亦能使我们在城市化进程将造就日益增多的陌生人社区之际,立足于新的情境,对个人参与结社和以面对面互动来建立初级群体式的亲密关系,重建生活共同体怀有一种基于现实的合理期待。